

修  
身  
篇

## 第一计 能屈能伸

### □ 屈于柔 伸于刚

老子说：天下最柔弱的东西，能够驰骋于天下最坚硬的东西之中。这是因为虚空无形的力量能够穿入没有空隙的东西里面。我由此知道无为的利益。不须用言语教导，不须讲解无为的益处，普天之下有什么能赶得上它呢？

列子说：天下有常胜的方法，有不常胜的方法。常胜的方法是柔弱，不常胜的方法是刚强。这两方面都容易明白，而人们却不去明白它们。所以，上古时代的谚语说：刚强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不能胜过自己；柔弱的人认为任何事物都可能胜过自己。认为不能胜过自己的，待到与自己相差无几时，那就危险了。认为可能胜过自己的，就不会有危险出现。用这种方法能取得胜利，用这种方法能应付天下的各种情形。这叫做不想取得胜利而自然取得胜利，不想应付各种事情而自然可能应付各种事情。

公元前 279 年 即赵惠文王二十年 秦昭襄王二十八年 秦昭襄王约请赵惠文王相会西河外的澠池（在河南省铁门县），相互订立友好盟约。

澠池本属东周管辖范围，但秦国已控制了这一地区，因此赵惠文王十分担心会被秦王作为人质而扣留。于是，他召集群臣，共商对策。

赵惠文王说：“秦王曾以会盟的名义欺骗了楚怀王，将楚怀王囚禁在咸阳，至今楚人还伤心不已。现在又约我相会，会不会像对待楚怀王那样对待我呢？”

廉颇和蔺相如都认为，如果赵王不去赴约，就是向秦示弱，会叫秦国看不起的。蔺相如表示愿意护送惠文王前去赴会；廉颇则表示，愿意辅佐太子固守本土。

赵惠文王听说蔺相如愿一同前行，便十分高兴地说：“蔺大夫尚且能完璧，何况寡人呢？”

平原君赵胜说：“昔日宋襄公单车赴会，就遭到了楚国的劫持；鲁君与齐王相会于夹谷，有左右司官陪同，就全身而退，即使有蔺大夫为您护驾，最好也要挑选五千名精兵作为随从，以防不测；此外再派大军离三十里外屯扎，这才是万全之策。”

赵惠文王听从平原君的劝谏，以李牧为中军大夫，使其率精兵五千名相随。并让平原君率大部队紧跟其后。

廉颇将赵惠文王一直送到边境上。廉颇对赵王说：“大王与虎狼之王相会，结果实难预测。现在我与大王相约，估计来往道路上和相会所费时日不超过三十天。如果过期您还未归来，我就请求按楚国的办法立太子为王，以杜绝秦国的非份之想。”赵惠文王表示同意。

赵惠文王和秦昭襄王如期相会于澠池。双方置酒为欢。饮至半酣，昭襄王借着酒意说：“我听说赵王精通音乐，而我这里有宝瑟，请赵王弹一曲，以助酒兴吧！”赵王脸红了，又不敢推辞。秦王侍者将宝瑟置放在赵王面前，赵王只得弹了一曲湘灵曲。秦王连声称好，并笑着说：“我曾经听说赵国的先祖赵烈侯十分爱好音乐，想不到您尽得家传。”于是，命令御史记下这件事。秦国御史就秉笔取简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相会在澠池，赵王为秦王

鼓瑟。”

蔺相如走到秦王跟前，说：“赵王听说秦王精于秦声，我特地恭敬地捧上瓦器，请求秦王敲击它，来相互娱乐。”

秦昭襄王十分气愤，对蔺相如不加理睬。蔺相如将盛酒用的瓦器取来捧着，在秦王面前跪着请秦王敲击，秦王就是不肯答应。

蔺相如说：“大王是否依仗秦国强大的兵力来欺负人？可是，在这五步以内，我就可以把我的血溅到大王身上。”

秦王的左右侍从被蔺相如的凛然正气征服了，谁也不敢上前。秦王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但慑于蔺相如的威严，只得勉强地将瓦器敲了一下。蔺相如这时才站起，将赵国的御史召过来，让他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赵王与秦王相会于渑池，秦王给赵王敲瓦盆。”

秦王的大臣见蔺相如如此作践他们的君王，就很不服气。其中有几位从宴席中站起身，对赵王说：“今日赵王惠顾，请您割十五座城池替秦王祝寿吧！”蔺相如也对秦王说：“既然赵国进十五座城池给秦国，秦国也应该有所回报，请秦国用咸阳替赵王祝寿吧！”

秦国的客卿胡伤等人私下建议秦王将赵王拘留起来。秦王不同意这样做。因为他已得到谍报人员的报告，说赵国布署得相当周密，大军就驻扎在附近，因而不敢贸然行事。秦王知道用武力不可能沾到便宜，就更加敬重赵王，两人相约为兄弟，保证双方互不侵犯。

渑池之会归来，赵惠文王非常感激蔺相如为自己挽回了面子。他对群臣说：“我有了蔺相如，就如泰山一样安稳，赵国的地位也就重过九鼎。蔺相如的功劳真是谁也没法比呀！”于是，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出廉颇之右（古人以右最尊）。

廉颇对此愤愤不平，认为赵王十分不公允。他忿忿地说：“我出生入死，攻城掠地，维护赵国的安全，从情理上说应是我的功劳最

大。蔺相如只不过稍微动了动口舌，能有多少功劳，官职却在我之上，况且他曾经是宦官的宾客？出身很低微，我怎么甘心屈居于他之下呢？今后只要我看到他，就一定要让他瞧瞧我的厉害。”

廉颇的话传到了蔺相如的耳朵里，从此每次上朝蔺相如都托病不去，以免与廉颇相遇。宾客们都以为蔺相如害怕廉颇，私下里常常议论这件事。

一天，蔺相如因故外出，恰巧廉颇也外出。蔺相如远远望见廉颇的车队，就让手下人将马车赶到小巷中躲起来。等廉颇的车队过去之后方才出来。宾客们十分气愤，就一块去见蔺相如说：“我们远离故土，抛却妻儿投奔您的门下，是因为看重您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廉将军与您同列班，况且职位在您之下，然而廉将军竟然口出恶言，可是您不仅不报复，反而在朝堂和路上都躲避他，您为什么如此怕他？真让我们感到羞愧，我们请求辞去。”

蔺相如说：“在你们看来，廉将军与秦王相比，谁更厉害呢？”

宾客们说：“那当然廉将军比不上秦王。”

蔺相如说：“以秦王的威严，天下没有人可与他抗争，而相如敢当面叱责他，侮辱他的群臣。相如即使没有才能，怎么也不会仅仅怕一廉将军。我考虑的是，强秦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两个人在。如果我与廉将军相争，两虎共斗必有一伤，这样就为秦国侵犯赵国提供了机会。因此，我强忍着不与他发生冲突，是将国家大计放在首位，个人的得失放在次位。”

宾客们都为蔺相如的高识大论所折服，此后更加敬佩蔺相如。

然而，蔺相如愈让廉颇，廉颇愈气盛。赵惠文王十分担忧这件事。虞卿就自告奋勇地说合廉颇与蔺相如。虞卿见到廉颇后，先是歌颂一番的功劳，然后话锋一转，说：“论功劳是你大，但论气量还是蔺相如大。”并将蔺相如对宾客所说的告诉了廉颇。廉颇听了

感到十分惭愧 肉袒负荆 跑到蔣相如家中请罪 说：“鄙人志量浅狭 不知相国如此宽容 就是死也不足以赎罪。”

蔣相如：“我们两人并肩事主 为社稷的重臣 将军能见谅 就是十分幸运的了。”

于是 两人相约 结为生死之交 虽刎颈不变 后人所说的‘刎颈之交’和‘负荆请罪’就来源于此。

要想刚，一定要用柔来守住它；要想强，一定要用弱来保持它。柔积得多必然刚，弱积得多必然强。看他所积的是什么，就晓得他所得到的福还是祸。用强来取胜于不及自己的，等到能与自己相匹敌时就易于损伤；用柔来取胜于超过自己的，那种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老子说：普天之下没有哪一样东西比水更加柔弱的，而攻克坚强的力量却没有哪一样可以超过水了。因为水的这种攻克坚强的力量是任何力量也改变不了的。弱可以胜强，柔可以胜刚，普天之下没有谁不知道这个道理，就是没有人依此而行。因此，圣人说：“能承受国家的耻辱 就叫做一国的君主 能随国家的祸难 就叫做天下的君主。”

## □ 人人心中有一屈

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追求，难免有越轨抢道、碰撞争执的时候。人人都不希望自己的行为受到太多的约束。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有些什么特点。一般来说，一个人行为的后果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这个行为的后果只涉及到他本人，与其他人或群体无关；二、一个人行为的后果将影响到他人的利益；三、一个人的行为的后果将影响到某一群体

或组织的利益。对于第一种情况，个人行为的自由是应该得到充分保障的，对于这种行为，他人可以规劝、说服、乃至恳求其改变，但没有理由干涉它或阻止它。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或其他群体时才需对社会负责。不过我们平时属于第一种情况的行为并不是很多，大部分行为是属于后两种情况：在后两种情况下，一个人行为的自由必须以其后果影响或不危害他人利益为前提，否则，社会就有权利干涉或中止这个行为。这个道理虽然极其简单，即是人类一切法律赖以存在的前提，也是社会舆论和道德标准的根基。

那么一个人怎样决定这件事自己做还是不做呢？西方人用穷举法为此设立了无数法律条文。中国人不喜欢被众多的条文所约束，再说不少中国人的文化水平也没有达到认识每一条法律条文的程度。中国人宁可用一种更模糊更简单的方式，凭自己的良心直觉来作出是非的判断与选择。在中国人看来，人心都是肉长的，人与人之间本来没有什么不同，糖吃起来人人都觉得甜，风吹上来人人都觉得凉。所以，一个人决定做不做一件事，不需要去问律师或法官的意见，只需问问自己：我做这件事所产生的后果我自己觉得如何，如果自己能够接受，那么估计别人也能容忍；如果自己不能容忍，别人肯定也不愿接受。这就叫以情度情将心比心。

人与人之间，能够真正形成沟通，达成理解，不是靠逻辑或教条而是靠感情 将心比心 需要借助于某种中介 这个中介就是人的感情。中国人常说“通情达理”四个字，一个人只有“通情”才能“达理”。不通情能不能达理？也能达理，但这只是一种机械的达理，是一种被动的达理。所以，一个中国人孝敬父母，并不是出于什么法律或道德责任，只是他觉得父母从小精心抚养自己，所以现在需要尽力回报；同样一个中国人讲究信用，也不一定不是为了履行

合同或诺言，只是他希望别人也能对他讲究信用。中国人之所以显得富有人情味，并非因为中国人懂得多深的人生哲理，也不是由于中国人熟记多少道德教条，事实上，中国人很少从哲理和教条出发来决定生活的取舍，他们只是简单地以自身的经验来衡量他人的感受，这种做法有时候遇到古怪而不通人性的人或许要碰壁，但好在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将心比心、声气相通，甚至肝胆相照，所以这种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处世艺术运用起来总是那么得心应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源于人的同情。同情对于人来说并不陌生，即使一个人从来不同情别人，至少也会被别人同情过。我们看到孺子将要落井，心中不免一紧，这便是同情；我们看到朋友不幸失恋，心头难免沉重，这也是同情。这里所说的同情并非仅仅是一种怜悯，怜悯是同情的一种，但同情不全是怜悯。在较高层次上说，同情当指把我们自己与别人或物等同起来，使我们也分享他们的感觉、情绪和感情。同情需要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为基础，过去的经验使我们了解在什么样的情况境遇下会产生什么样的感情和情感，当我们看到别人处在自己曾经处过，或者凭经验很容易在想象中体验的情境时，我们就开始将心比心，设身处地地把自己与他们等同起来，去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己欲，什么是他欲，以及什么是己所不欲，什么是他所不欲，便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接下来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在古人看来，人的同情心乃是一种崇高博大的情怀，是人与人以及人与物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在传统社会里这种道德意境被概括为“仁”。

## □ 能忍者善屈

人与人交往必须先过一道关，什么关呢？“忍耐”关。忍什么？一是忍气，二是忍辱。气指气愤，辱指屈辱。气愤来自于生活中的不公，辱产生于人格的褒贬。忍气是为了求安，凡事要想得开，看得远，正如俗语所言：“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中国人讲究处世要能够忍气吞声，做人要学会忍辱负重。在中国人眼里，忍耐是一种美德，是一种成熟的涵养，更是一种以屈求伸的深谋远虑。

“吃亏人常在，能忍者自安”是提倡忍耐的至理箴言。忍耐是人类适应自然选择和社会竞争的一种方式。大凡世上的无谓争端多起于芥菜小事，一时不能忍，铸成大祸，不仅伤人，而且害己，此乃匹夫之勇。凡事能忍者，不是英雄，至少也是达士；而凡事不能忍者，纵然有点愚勇，终归城府太浅。人有时大愚，小气不愿咽，大祸接踵来。人应该为自己的快乐而活着，切莫因别人的失礼而生气。谁都不愿被别人所左右，如动辄生怒，恰恰自陷于受别人左右的陷坑，不仅左右你面部表情，而且左右了你的心理情绪。这样你最易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激将法”正是如此。忍耐并非懦弱，而是于从容之中冷嘲或蔑视对方。唐代高僧寒山问拾得和尚：“今有人侮我，冷笑我，藐视我，毁我伤我，嫌恶恨我，诡谲欺我，则奈何？”拾得答曰：“子但忍受之，依他让他，敬他避他，苦苦耐他，装聋做哑，漠然置之，冷眼观之，看他如何结局？”这种大智大勇的生活艺术，用老子的“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这句话来评论恰如其分。

无论是民族还是小人，生存的时间越长，忍耐的功夫就越深。生活在世上，要成就一番事业，谁都难免经受一段忍辱负重的曲折

历程。因此，忍辱几乎是有所作为的必然代价，能不能忍受则是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吧。韩信受辱胯下，张良纳履桥端，皆英雄人物忍辱轶事。屈辱能令人发愤，催人奋进，是一种无形而巨大的向上动力。

忍耐作为处世艺术，具体运用的方式一般有两种：一、压抑；二、遗忘。心理健康的人，能够比较自如地调节内在的心理防御机制，将生活中不快的负性事件及其引起的不良情绪或压抑到意识之下，或遗忘于意识之外。压抑与遗忘比论，遗忘更洒脱彻底。被迫的忍耐无疑有强行压抑的痛苦。人世间确有许多事是忍无可忍 连素来温厚的孔老夫子也曾尝“是可忍 孰不可忍”的苦味。是否可忍的关键并非在事情的本身，而在于你自己视它为多少份量。如果对生活中的睚眦怨气时时铭心刻骨、耿耿于怀，那么忍耐这一关是难得跨过去了。反之，对芥菜小事皆能视而不见、过后即忘，则能“淡泊以明志 宁静以致远”。中国人以坚毅忍耐著称于世 崇奉“忍耐”是一种社会人格成熟完臻的体现。

## □ 大屈者终能大伸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是常理。不思善不思恶自然就没有作好作恶，这各不落两边的心态就是心之本体，这种心体敢于自我承当，自我保持平衡，自我反省，这种平衡的心态就是：“未发之中”。

何谓“至善”不但没有恶 连善也没有 唯有事物的本源 自然之本体便是“至善”。明白了“至善”那么为何在“格物”上下功夫，也就自然明白了。所以，人们不要拘泥于一事一物，事事物物都要顺其自然之规律，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是过，过分的修饰是偏，

二者都不能‘至善’。

心随五官追求外物，那么心中的和气就会受到污损，恶念即可能由此滋生；得道的人，心能统领五官，外物变化而心中和气不会受到污损，和气存养于心，善念自然萌生。

元褒先生是原州的最高长官，那天，他正端坐在大堂之上，突然有一商人前来报案。原来商人在旅馆被盗，他怀疑是和他同住一室的人干的，于是把那人扭送到官府来。

元褒先生听取了双方的陈词，觉得原告缺少充分的证据，讼词中有不少是虚妄的猜测；再听被告的辩护，更觉得被告理直气壮，不像做贼心虚的样子，察颜观色，又发现他的神色像受了冤屈，于是把被告放走了。

商人气愤不过，越级上告，把案子捅到了隋文帝那儿。商人控告元褒受了盗贼贿赂，放走了盗贼。为了端正风气，隋文帝命令纪律检察和监察部门官员去调查此事。携着材料带着尚方宝剑的调查团很快开到原州。

原州上下风波顿起，大家猜想，元褒是个清廉的好官，绝不会受贿释盗；但案件明摆着没有了结，不知道谁会遭殃了。

团长找到元褒，希望他能讲实话，以便把事情真相弄清楚，而且暗示即使他犯了错误，只要能找一个替罪羊，也可以不予追究。元褒告诉调查团，盗贼确曾贿赂过自己，所以把他放走了。自己犯了受贿罪和渎职罪，理应二罪并罚，判个三年五载的。

既然这样，调查团只好把他带到京城。很快，他被免除了官职。朝廷上下都讨论元褒的错误，案情通报一直发到了最下边。一时间，朝野哗然，元褒形象一落千丈。

过了不久，抢劫商人的真正罪犯在其他地方被抓落。一件悬案水落石出，元褒的冤案也很快得以平反，元褒的名誉得到恢复。

其自诩的风范、清廉的美德流布四海之内。

文帝很是感动，又颇疑惑。他问元褒：“爱卿，你是朝廷重臣，德隆望尊，当初何必为一件小事而损害自己的名誉和地位呢？如果不是老天有眼，你岂不是要一辈子背着黑锅？”

元褒坦然地说：“我也不愿平白无故地受冤屈，因为我是原州的父母官，盗贼在原州为非作歹，这是我的第一罪状；本州的百姓受诬告，不把他交给司法部门，却把他放了，说明我法制观念太差，是我第二罪状；第三，尽管我对这案子判断正确，但找不到真实凭据，是我办事无能。我有这么多错误，怎么能够不引咎自责呢！再说，如果我不说自己受贿，调查团一定会穷追不舍，那么更多无罪的人会受到干扰，这就更加重了我的罪责。所以我承认我有罪了。”

受贿而释放盗贼，不仅关涉名誉，而且必受法律制裁。元褒之所以敢于承担恶名和后果，大概是以为，自己纵使受了天大的冤枉，总会给世人带来更大的利益。以己之所失，换取百姓的太平安定的生活，对于一个封建官僚来说，心胸不可谓不宽广了。为自己利益而屈，隐姓埋名地修炼，或者受人胯下之辱，只是忍小而谋大，这样的人诚然值得佩服；为他人集体而屈，牺牲个人利益，实在是心胸宽广 品德高尚 更让人钦佩。为官一个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人们该学学元褒。倒不是叫他们自诩自谤，而是像元褒一样 以一种长者风范 不计较个人得失 为民造福 代民受过。只有这样，才能为官一处，造福一方。

一个人尤其是领导者，在待人方法上有两条原则，对于功劳和过失，不可有一点模糊不清。功过不明就会使人心灰意懒不肯上进 对于恩惠和仇恨 不可表现得太鲜明 如果对恩仇太鲜明 容易使人产生疑心而发生背叛。

## 第二计 刚柔相济

### □ 刚柔并用 戒绝浮躁

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远志向，必须要抑制急躁的脾气、暴躁的性格。做事戒急躁，人一急躁则必然心浮，心浮就无法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中去认真研究和探讨其发展的规律，无法认识其本质。心浮气躁，办事不稳，自然会发生差错。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就在于以刚柔并济，以静制动，处安勿躁。

1955年下半年至1956年初，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和国内农业的丰收，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使党的主要领导人开始脱离中国国情，提出不切实际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思想。

在及时察觉党内已经滋生急躁冒进的倾向的情况下，周恩来不顾被扣上“右倾保守”帽子的危险，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制止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斗争的继续开展，果断地提出反对急躁冒进。

1956年1月20日，周恩来在党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呼吁：不要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计划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

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冒进的错误。”

2月6日，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一起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严重问题。他明确指出：既然已经出现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经过两会努力，年度基本建设投资压到147亿元。这就是后来周恩来多次从积极意义上所讲的“二月促退会议”。

自1956年6月上旬起，周恩来进一步强调反对和纠正经济工作的急躁冒进倾向，继续宣传反冒进，削减1956年计划预算指标，引导本年度经济工作由冒进向健康的道路发展。他果断地对这个年度的过高指标采取了“压一压”的措施，特别是对严重妨碍当年计划平衡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作了较大削减，使计划比较符合实际。这一计划执行的结果，使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果，减少了由于冒进造成的不应有的损失。

1956年9月15日到27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八大”后，周恩来的注意力转入到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研究。

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由国家经委承担。经委是不赞成冒进的，问题是各部、各省市自治区一开始上报的指标，还是要价很高。报的基本建设投资指标共计为243亿元，比1956年的140亿元多103亿元。前面讲到1956年计划已经“冒”了，1957年再“冒”这么多，当然不行。经委只好大刀阔斧地往下压，但经委压到150亿元时，各部门各地区反对再往下压了。面对这种情况，

周恩来认为，急躁冒进情绪还未平息，还得继续反冒进。他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细细体会马克思阐明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使他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有了更深的认识。他认为，大抓经济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人民的生活也要改善。既要重工业，又要重农业，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

11月10日，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保证重点 适当收缩”的方针 经过充分讨论后被八届二中全会接受。在这个计划指导下，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 使 1957 年的经济工作成为建国以来最好的年份之一。

反冒进 不仅使 1956 年经济发展避免了重大失衡，而且对实事求是地确定八大经济决策和 1957 年计划的指导方针有着重要的影响。

荀子在《劝学》中说：“蚯蚓没有锐利的爪牙 强壮的筋骨 但却能够吃到地面上的黄土，入下能够喝到地底的黄泉水，原因是它用心专一。螃蟹有六只脚和两个大钳子，它不靠蛇鳝的洞穴，就没有寄居的地方，原因就在于它浮躁而不专心。”

轻浮、急躁 对什么事都深入不下去 只知其一 不究其二 往往会给工作、事业带来损失。我国在 50 年代提出的不切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急躁冒进的思想带来的后果，反映了“欲速则不达”规律的准确性。

天下成大事业者，无不是专一而行，专一而攻。博大固然不错，精深才能成事。要求精深，要求在某个领域中成为专业人才，务必克服浮躁的毛病。

刚不是浮躁。浮躁之气生于心，行动起来就会态度简单、粗暴，徒具匹夫之勇，结果只能害了自己。戒除浮躁的确不容易，要

有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心，才能做到这一点。但只要有毅力有信心，胸中有个远大的目标，浮躁又有什么不能戒除，事业又有什么不能成功呢？

## □ 刚发乎内 柔形于外

一个人表现于外的柔是随和，表现于内的刚是自尊。自尊是自我规矩，自我规矩便能刚能柔。自尊并不是自我夸大，唯我独尊之意。夸大就会倾向于狂妄，就会流于怪诞。因此自尊与自大极有区别。自尊心的主旨是使你自己瞧得起自己，明了自己所得之于天地，并不少于任何人一分。只要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精进如斯，历史上圣贤豪杰就不会少你一份。

因此做人不能自暴自弃，而辜负天赋，辜负人生。

自尊心是一种美德，是促使人不断向上发展的一种原始动力。莎士比亚的名言是：“假使我们自比于泥土，那我们就将真的成为被人践踏的泥土了。”又说：“没有自尊心的人 即等于自卑。”自卑的人 常常安于现实 安于平庸 不求进取 总觉得自己不如人。实际上天赋予你的，并无不如人的地方。只要你能自我发掘，自我奋斗，只争朝夕，绝对有所成就。所以能自尊的人，决不会自卑。

1943年6月28日，周恩来为了正确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坚决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专程回延安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途中，接到延安来电，告知胡宗南部队侵人边区境内修筑工事，毛泽东嘱咐周恩来就近同胡宗南交涉。于是，周恩来先去了西安。

7月9日，胡宗南得悉周恩来到来时，假装欢迎，吩咐黄埔六期以上30名将官偕夫人出席当晚的酒会。酒会名为周恩来接风

洗尘，实则是想把他灌醉，使他当众出丑。中共地下党员熊向晖得知这一阴谋后，悄悄告诉了周恩来。于是，这场酒席桌上的斗争悄然无息地展开了。

酒会由胡宗南的政治部主任王超凡主持。他在祝辞中首先提议：“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干杯！”周恩来微笑着站了起来，可他并没有喝酒，他环顾四周，然后声音宏亮地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合作。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员，也请各位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胡宗南一听此言，当即愣住了，其他作陪者也面面相觑。周恩来见状依然微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酒就免了罢。”

过了一会儿，十多位花枝招展的国民党将官太太一齐举杯向周恩来走来。其中一位抢先说道：“我们虽没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倡导的‘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敬周先生一杯。”周恩来微微一笑，十分风趣地对她们说：“各位夫人都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此话一出，众夫人张口结舌，目瞪口呆，窘态百出，无处容身。胡宗南见状赶忙打圆场说：“今天只叙旧谊，不谈政治。”周恩来随即转向那些夫人说：“我们还是谈点别的吧。”他同她们寒暄了几句，便把她们送回了原座。

稍后，又来了十几位将官，他们排成整齐的一行，领头的一位对着周恩来说：“当年我们是黄埔学生，您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弟子，我们每人敬老师一杯！”周恩来说：“胡副司令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请问胡副司令长官，这杯酒该不该喝？”胡宗南一时语塞，过了一会儿，他才满面通红地吼道：“他们